

# 中國內地創新型大學建設過程中的理念導向

## ——論經典大學理念與現代大學理念間的張力\*\*

周谷平 張雁 \*

浙江大學

考察中西方大學理念流變史，可以發現同一種大學理念與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組織結構相結合，就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效果與歷史作用。綜觀大學發展歷程，美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聚集地的原因，就在於它能較充分地掌握經典大學理念的繼承與超越之間的關係。本文所指的經典大學理念是以德國大學所奉行的學術研究至上、教學與研究統一、學與術分離的理念為代表；現代大學理念則以美國大學為代表，是建立在學術本體意義上的實用主義理念。由德國經典大學理念向美國現代大學理念的轉化是一個延續、互動的過程，而非表面的割裂，亦非相悖而行，兩種理念共同建構了現代大學人的創新思想趨向和行為模式。當下中國學界視域的盲點在於談及創新精神時，只會聯想到現代大學理念的世俗化實用主義原則，而忽視了經典理念的原動力作用。本文嘗試通過研究這兩種扎根於不同社會組織結構層面的大學理念對大學人群體心理趨向與創新型行為

---

\* 周谷平，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雁，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

\*\* 本文是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NQ05JY01）的分段研究成果。

所產生的實際動力，從理念層面揭示大學人創新精神的培育對創新型大學建設的重要意義。

大學與大學理念都是近代中國從西方導入的舶來品，從傳統文化層面看，儘管中國古代有太學、國子監等高等教育機構，但官本位教育以所謂的「學而優則仕」使其成為依附政治的組織。讀書人群體事實上是社會權力結構的附庸，始終沒有形成具有獨立人格、以學術為本位的知識分子階層，缺失產生經典大學理念的土壤。中國在建設創新型大學過程中存在著經典與現代理念雙重缺失的困境，既要面對經典大學理念與現代大學理念間的張力，又要承受經典大學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間的張力。大學創新精神源於經典大學與現代大學兩種理念的有機構成。由此可知，中國大學人的努力也應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不僅要更現代也要更經典，這是中國建設創新型大學時應一以貫之的原則。

## 一、現代與經典理念的張力：美國大學發展的動力

西方大學人對大學理念的自覺思考和探索始於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德國，在這數十年間，康德（I. Kant）、施萊爾馬赫（F. D. E. Schleiermacher）、費希特（J. G. Fichte）、謝林（F. W. J. von Schelling）、席勒（F. C. S. Schiller）、洪堡（F. W. von Humboldt）等人撰寫並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大學教育的論述。這些文章充分展示了這批學者對大學本體的思考、認識和看法，他們集中闡述的大學論在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學（Universität zu Berlin）得到了具體的實踐。洪堡認為「教師不是為學生而設，兩者都是為學術而共處」<sup>1</sup>，學術研究的最終目標是取得新穎的知識，因此：

1 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2、34-35、198。

大學不再以博覽群經和熟讀百家為能事，卻要求學生掌握科學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從事創見性的科學研究。<sup>2</sup>

他相信奉行這類理念的大學具備「不僅能為政府眼前的任務服務，還會使大學在學術上不斷地提高」的雙重效用。<sup>3</sup>柏林大學作為真正的科學研究和科學教育機構典範，自此獨領風騷近百年，德國的大學也成為世界各大學仿效的榜樣，執世界大學之牛耳，走在世界大學發展的前列。

人們總以為大學的發展必定與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密切相關，然而德國的大學發展卻非如此。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的德國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帝國的皇帝只是名義上的統治者，邦國林立，境內國土成為歐洲諸強爭雄的戰場，伏爾泰（F. M. Voltair）嘲諷地指出「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變得既不神聖，又非羅馬，也不是一個帝國。」<sup>4</sup>德國的大學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開始發展，而柏林大學則是在十九世紀初，普魯士（Prussia）戰敗的廢墟上建立起來，並成為「國家必須用學術力量補償在物質力量上受到的損失」的象徵。<sup>5</sup>從某種意義上說，宗教改革運動塑造了新人文主義運動，後者又塑造了德國大學人與大學文化，即經典大學理念；而大學人與大學文化則塑造了德意志民族意識，構成民族文化共同體，最終塑造了德意志國家本身。

德國經典大學理念承繼並揚棄了中世紀大學理念。它建立在新人文主義哲學基礎上，以關乎人的知識為根本，以實現人的價值為目的。這裏所謂的人，既包含小寫的人，也包含大寫的人<sup>6</sup>；既追求個

2 鮑爾生（F. Paulsen）著，滕大春等譯：《德國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頁125-126。

3 同上注。

4 勒納（L. E. Lena）、米查姆（S. J. Michamu）、伯恩斯（A. M. Bo'ensi）著，王覺非等譯：《西方文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頁302。

5 湯普森（J. W. Tangpusen）著，孫秉瑩、謝德風譯：《歷史著作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下卷第三分冊，頁203。

6 大寫的人指整個民族，小寫的人指個體或小群落。

人價值的實現，也追求民族、國家、人類的價值體現。德國經典大學理念承繼的，是中世紀大學追求的知識本身就有其價值的態度，因此價值理性主義成為經典大學理念的特徵。它揚棄的則是中世紀大學建立在形式邏輯基礎上以彼岸世界為目的、以只有能證明上帝的知識才有價值的大學理念。

學術至上的德國經典大學理念對高等教育發展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美國大學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以德國大學為楷模，尊崇經典大學理念。在1815至1914的一百年間，約有一萬名美國學生到德國的大學學習，在十九世紀後半葉，許多美國學術界的知名學者、眾多大學的校長幾乎都有留學德國的經歷，這對美國大學與學術發展影響極大，因為他們獲得了：

智力習慣（學者個人及其學術的獨立性）、智力方法（思想上的全面性或準確性）、智力和道德信念（深信所作所為將為美國的知識和學術增添財富），……這些敢於涉獵新領域、發現新真理的理想被留德學生帶回美國。<sup>7</sup>

留學生對德國學術的推崇從留德的哲學家羅伊斯（J. Royce）以下的評論可見一斑：

惟有德國的學術是我們的老師和引路人，一個初去德國的人對理論生活的可能性仍抱有懷疑的態度，回國後即成為一名為了求知而將時間都用在純粹知識上的理想主義者。<sup>8</sup>

7 賀國慶：《德國和美國大學發達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16、122-125。

8 同上注。

德國經典大學這種不受功利主義影響的純學術探究理念，以及學生個性在此基礎上的全面發展取向，成為美國大學的辦學旨歸。

隨著美國經濟發展，社會與政治結構深刻變革，歐洲以學術超越世俗社會的必要性逐漸淡化。崇尚有用的知識使人們對大學教育脫離現實的狀況提出質疑和批評，1857年佐治亞州（Georgia）的一份報紙刊登的批評文章這樣寫道：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不同的時代，一個需要實用知識的時代，但是州立大學卻沒有跟上這樣的時代，因而不能滿足州的需要，這個時代需要有實際技能的人。<sup>9</sup>

美國大學的改革逐漸傾向於世俗化與商業化，注重知識的實用功能及大學對社會的反哺，這些特徵也成了大學理念現代化的代名詞。從1862年《莫里爾法案》（*Morill Act*）產生的贈地學院（又稱農工學院）所形成的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Thought*）極大地推動了大學與工農界的結合，經1887年的《哈奇法案》（*Hatch Act*）和1914年的《史密斯－利弗法案》（*Smith-Lever Act*）鼓勵大學與企業合作，以至1980年出台的《拜多法案》（*Bayh-Dole Act*）使得大學知識產權迅速發展，體現了美國大學從邊緣化的象牙塔走向社會中心的過程。這些法案建構了美國大學與社會的聯絡圖。通過立法建立大學為社會服務的體制，推動大學積極參與研究成果社會化、市場化的工作，更踴躍參與地方經濟發展，課程設置亦更著重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凡此種種使美國大學成為現代大學理念的代表。

美國現代大學理念是建基於德國經典大學理念基礎上，並經過調適、融合與本土化的過程，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辦學理念，它把教

9 王英杰：《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7。

學、研究和服務社會結合了起來。在傳統與創新之間每每都能尋找到契合點，這使美國大學從二十世紀開始成為世界大學發展的領頭羊，到目前為止，美國大學一直都是大學模式與功能創新的先行者。

大學對美國社會的發展貢獻良多，正如科爾（C. Kerr）所言，美國大學：

在維護、傳播和研究真理方面的作用是無與倫比的，在探索新知方面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在服務社會方面所做的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sup>10</sup>

美國大學的發展使大學的象徵由象牙塔轉變為「社會軸心機構」、「社會發展的發動機」。大學與社會的聯繫日益緊密，大學的服務功能也日益凸顯。

在大學現代化過程中，功利實用主義的技術研究與非功利性的科學探索始終存在著巨大的張力，這也是推動美國大學發展的內在動力。儘管大學學術傾向世俗化、實用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但來自傳統的呼聲始終沒有停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校長弗萊克斯納（A. Flexner）、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校長赫欽斯（R. M. Hutchins）等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弗萊克斯納批評當時的大學變成五花八門的機構，認為工商管理學、新聞學、家政學、教育學、社會服務學、圖書館學都不應該在大學教育範疇出現。這些職業培訓是大學既不必要也不應該承擔的。赫欽斯則致力於將功利主義、職業主義從大學校園中分離出來。他認為實用主義在大學的泛濫及公眾讓大學淪落為世俗

10 C. Kerr,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44-45.

壓力下缺乏理念的機構是錯誤的。赫欽斯堅持大學應是人類的精神家園，「大學的目的是在全世界進行道德的、知識的和精神的革命。」<sup>11</sup>

弗萊克斯納與赫欽斯這種理想化的大學教育觀，表明當時的美國依然有一批經典大學理念的堅定擁護者。他們反對功利思想在大學瀰漫，認為大學應該獨立於社會，作為社會的精神家園，以自由追求純粹真理為至高無上的使命。弗萊克斯納發表的文章〈無用知識的有用性〉（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在當時科學界引起極大反響。他認為：

有益於人類的大多數真正的偉大發現，並不是由實用願望所推動的，而是由滿足好奇的願望所推動的。……它們（好奇心）偏離立竿見影的應用越少，它們對人類福利和智力興趣的貢獻會越大。<sup>12</sup>

堅持經典大學理念的人認為，追求有用的知識，容易變成一種思想的束縛，因為一味追求對世俗的有用，知識怎能真正發展？

堅持經典大學理念學術至上的價值取向，以及堅守可以實踐的知識才是有價值的實用主義取向，這兩種大學教育觀構成了美國大學發展中的一對矛盾。但正是這種矛盾推動著美國大學不斷在傳統與創新之間尋求平衡，使大學能在經典和現代理念的張力中不斷前進。

學界對學術化知識與職業化知識的爭執由來已久。但美國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和工商界的壓力造成社會對大量實用知識的需求，卻是不爭的事實。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戰爭的驅動下，美國大學的應

11 王英杰：〈大學校長要有大智慧——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建立與發展經驗〉，《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5年第1期，頁15。

12 弗萊克斯納（A. Flexner）著，陳養正譯：〈無用知識的有用性〉，《科學對社會的影響》，1999年第1期，頁51。

用研究突飛猛進，六十年代科爾提出的多元大學理念將各類大學教育納入在超級大學<sup>13</sup>名下，學術化取向與職業化取向的教育並存。七十年代，美國九成以上的本科生認為獲得職業培訓和技術是大學教育的基本或重要目標。這種極度職業化取向的大學教育再次引發了高等教育界對該趨勢的批評。但當時的哈佛大學校長博克（D. Bok）卻認為「高等教育界不應譴責這些無法控制的趨勢」<sup>14</sup>，學界該做的是在兩者中取得一個平衡。八十年代博克提出大學要超越象牙塔，肩負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國の後工業社會特徵更清晰地呈現出來，一種科學思想從誕生到轉化為技術、應用於社會的時間大大縮短。同時，大學受市場化取向的公共部門改革影響，逐步確立了市場運作機制，大學的企業化特徵日益明顯。九十年代的克拉克（B. R. Clark）提出自主創業（新）型大學的概念，使大學能更適應時代和社會的需要。由此看來，經典大學理念似乎已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但事實上這種理念在美國大學仍以一種群體潛意識的形態，作為制衡的力量保存下來。這種超個體的共同心理基礎就如樹的根，儘管你看不到，但它依然深植於土壤中。

克拉克在2000年對其1998年提出的創業型大學概念加以深化與補充，他特別提到：

大學自主創新並不損害共治的精神，它並不要使大學做工業的侍女，它也不要使大學變得商業化，成為有著各種用途的購物中心。<sup>15</sup>

13 此處的多元大學與超級大學所指相同，英文均為multiuniversity。

14 D. Bok, "President's Report 1976-1977," *Official Regis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 LXXV (August 4, 1978): 3.

15 克拉克（B. R. Clark）著，王曉陽譯：〈自主創新型大學：共治、自治和成功的新基礎〉，《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頁1。

在他看來，純粹的商業化和工業化與自主創新型大學的宗旨背道而馳。從這段論述中，我們可以深深感受到經典大學理念已成為美國大學人的思維原型和根基。

上述考察讓我們發現學術的價值取向與工具取向的互相結合與平衡構成了現代大學的精神實質。美國現代大學理念的形成並非僅是一個將學術社會化和市場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賦予其價值的過程。它既恪守了象牙塔的內在發展邏輯，又相應地承擔了引領社會前行的責任。一言以蔽之，美國大學理念是經典大學理念的現代轉型，是對經典的創新與超越。

## 二、「雙重缺失」：大學理念在中國的迷茫

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在中國是一個舶來品。太學、國子監、書院等古代高等教育機構雖然表面上與歐洲中世紀大學有著相似的地方，但在中國古代，國家利用官本位的教育控制學術的發展方向，同時世代讀書人以進入官僚階層為畢生追求的人生目標和價值取向，教育具有鮮明的政治功能。從社會經濟層面看，中國古代讀書人缺乏經濟獨立能力，他們在社會經濟結構中是失效的，只能依附統治階級生存。古代知識分子對政治的興趣和入仕的追求遠勝於對知識本身，而「學成文武藝，貸於帝王家」的政治抱負更取代了學術抱負。這種種因素導致上述機構只能是中國式的古代高等教育學府，而非現代意義的大學。

1898年京師大學堂的建立，標誌著中國政府引進西方大學這種異質教育的嘗試。然而，它雖有大學之形，卻缺大學之實。換言之，京師大學堂從日本間接移植了西方大學的相關制度，引入相關的教學內容，但事實上依然沒有擺脫舊式「官僚養成所」的實質。整個構架缺

失了對大學生存有決定作用的理念導向，使這種大學不能成為真正的現代大學。

經典大學理念的引進與蔡元培密不可分。1910年他在留德期間在《教育雜誌》上發表以〈德意志大學之特色〉為題的文章，有系統地介紹了德國大學理念。

大學教育目的，非職業上實地之訓練，而在授以科學的知識與科學的研究之途徑。故德國大學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為一。<sup>16</sup>

這是近代中國首次介紹經典大學理念的核心要素。1912年蔡元培就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期間，制定了新的學制系統，草擬並發佈了《大學令》。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閥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闡明了中國大學教育的目標。經典大學理念對中國大學的影響得到進一步深化，但該理念的具體實踐則在1917年由蔡元培主理的北京大學來完成。

面對一所充滿腐敗氛圍的舊式官僚學府，蔡元培從大學人觀念、師資建設、管理體制、學科和課程設置等各方面對北大進行全方位的改造。「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成為他辦學思想的核心。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北大在中國首先形成了具有獨立人格的大學人團隊。他們秉承德國經典大學理念，以實現國家、民族與個人的共同價值為目標，同時奉行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場所的理念，以求知為業，追求人格的獨立與學術的創新。在經典大學理念引領下，北京大學獨領風騷，並取得當時中國最高學府的領導資格。

16 蔡元培：〈德意志大學之特色〉，《教育雜誌》，1910年第11期。

經典大學理念植入中國，帶有一定的歷史偶然性，而且與蔡元培具有德國人文主義哲學的學術背景及卡里斯瑪人格（charisma，即令人信服和敬畏的超凡魅力）息息相關。然而，除北大外，可以說整個近代中國大學從一開始就深深打上了美國的烙印。上世紀二十年代，在中國大學發展進程中，美國大學理念對其制度以至實踐層面都產生了主導性和先行性的影響。學界一般認為取向轉變的歷史原因包括：大量庚款留美學生回國並逐漸掌握教育行政部門和大學的領導權；美國教育家杜威（J. Dewey）、孟祿（P. Monroe）等相繼來華講學和考察，傳播實用主義思想；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政治中心的轉移導致奉行美國大學理念的中央大學<sup>17</sup>迅速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國際地位迅速上升，中國人對其認同度提高等等。筆者認為這些的確是造成這一歷史更迭的部分原因，但並非決定性的。德國經典大學理念被美國現代大學理念所替代，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中國本身的傳統。

中國傳統的實用主義文化與工具理性主義認識論，使古代的先哲不太關注知識的本身價值，而把重點放在實際運用的智慧上。荀子說：「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故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sup>18</sup>在荀子看來，若知而不行，即使知道很多也沒有用處，只有產生實際功效的行為，才是值得肯定的。傳統儒學為實踐標準所添加的功用內涵，奠定了中國重行主義的理論基礎。此後，中國知識分子都以「事功」為準則，經世致用的重行主義價值取向根深蒂固地將古代的政治事功與現代政治經濟並重的事功囊括在內。這種功用主義的文化傳統顯然與經典大學理念中的知識本位觀有著內在的矛盾和衝突。因此，在經典大學理念中認為知識具有本體意義這一要素，實在難以讓主流的工具理性主義所接受。

17 中央大學的前身為東南大學。

18 荀況著，蔣南華等注譯：《荀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31。

留學美國長達八年之久的竺可楨對美國大學理念的實質有深刻的理解。他主理浙江大學時，既注重通才與專才教育共同發展，認為「培養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學者有主動求知和不斷研究的能力」，<sup>19</sup>又重視大學應服務社會、引領社會道德風尚及振興科學的學術責任。在他看來，「大學側重應用科學，而置純粹科學、人文科學於不顧，這是謀食不謀道的辦法」。<sup>20</sup>因此，浙大學科設置「應包涵行上的原則之學，和行下的應用之學」。<sup>21</sup>竺可楨告誡學生：「諸君到大學來，萬勿存心只要懂了一點專門技術，以為日後謀生的地步就算滿足。」<sup>22</sup>他理想中的大學是承擔學術使命與社會使命於一體的，既包含學術化的價值取向，也具有服務社會的工具觀這一內涵。竺可楨認識到美國現代大學理念是在揚棄和超越經典大學理念的過程中產生的。表面看來，美國大學理念偏重經濟與社會的實用主義原則，但它的根仍是深深扎在傳統大學文化的土壤中。

然而，時勢所然，為適應軍事和經濟需要，擔負教育救國的重任，大學的實用功能被放大，並與傳統深厚的工具理性主義相結合，導致國人對美國大學理念的誤讀。1929年教育部討論大學組織法時，將大學宗旨定為「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sup>23</sup>，而竺可楨提出將通才教育納入大學課程的提議未獲通過<sup>24</sup>。自此，經過外在時勢與中國文化的過濾，現代大學理念內涵中的經典部分只留在濾紙上。一方面是國家危難當頭需要大學提供實用效能，另一方面國人運用自己

19 竺可楨：〈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國立浙江大學校刊》（內部出版物），1936年，頁248。

20 竺可楨：〈新生談話會訓辭〉，《浙大日刊》（內部出版物），1936年9月23日。

21 張彬：《倡言求實，培育英才——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53、158。

22 同上注。

2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五輯第一編，頁171。

24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4年），第十卷，頁168。

的文化視野來作出取捨，將美國現代大學理念理解為僅是實用主義和直接服務社會，這一做法影響了中國大學的發展，而這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綜上所述，兩種大學理念在中國的不同命運，從深層次上說明了經典大學理念在中國「水土不服」以及美國現代大學理念被中國文化誤讀和同化的過程。美國大學理念體現的是建立在學術本位意義上的實用主義，我們選擇的卻主要是實用主義部分，而非美國大學理念的根。

西方大學發展史表明，中世紀大學理念轉型為德國經典大學理念，再轉型為美國現代大學理念是一個不斷繼承與超越的過程。各理念之間存在著張力，而這種張力推動大學不斷創新和發展。發展過程的其中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由知識本體意義的有效性向世俗意義的有效性轉移，這是移出象牙塔融入社會的過程。中世紀許多學者從事科學研究，目的是證明上帝的存在，具有厚重的救贖情懷。隨著工業革命興起，知識本身就是目的這一價值理性觀和知識應該經世致用的工具理性觀開始融合。這一點在經典與現代大學理念中得到了清楚的詮釋。

西方知識創新的三種原動力與大學理念密切相關，一是由興趣和好奇心推動；二是源於中世紀知識本身具備救贖價值的信念；三是有用知識對「無用」知識的需求。但中國的大學在發展過程中，一直面對經典理念與現代理念雙重缺失的情況。一方面中國傳統的「重行主義」文化缺失經典大學理念對知識本體意義的追求；另一方面因近現代中國的形勢所迫，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在自覺與不自覺間佔據了中國大學理念的主體。但是，創新原動力的缺失，最終難以充分達成現代大學理念對功利主義的追求。正是由於這種雙重缺失，導致中國大學在發展歷程中一直存在著理念上的迷茫。

### 三、衝突與制衡：中國創新型大學的構建

中國大學起步伊始便先天不足，這種不足不僅呈現於經典大學與現代大學理念的雙重缺失，也顯現在經典大學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間的張力。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轉型是從政治實用主義轉化為經濟實用主義。這兩種實用主義的轉化，在本質上是相通的，不存在彼此的張力，它們都缺乏經典大學把研究高深學問作為一種基本的生活態度、追求知識成為一種價值本體的實質內容。

在中國人的生活態度中，重行主義知識理念佔主導地位，只有實用知識才有價值，或者說，能換取功利的知識才有價值的觀念一直佔據著學人的心理。因此，知識的實用主義化引領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典型的事例如科舉的八股考試，把國家利益與個人功利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該考試成為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主流文化。時至今天，我們也面對同樣的問題，儘管知道格式化教育對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造成障礙，但因其實用主義的有效性，依然受到熱捧。

大學理念的雙重缺失，導致中國大學從未真正追求過經典大學理念所訴求的知識本體意義。大學本身傳統的缺失和固有的文化基因，對中國建設創新型大學構成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原創性科研成果匱乏、學術腐敗等都是上述缺失的後果。科研管理與考核機制的異化，更直接形成了急功近利的學術取向。中國大學科研論文重量不重質，出版的論文數量已躍居世界前列，但能真正體現原創性思想兼具國際一流水平的論文卻仍是鳳毛麟角，這尷尬的狀況已引起眾多有識之士的質疑和反省。

知識倫理建立在追求價值理性的基礎上，當價值理性缺失時，知識倫理的喪失便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一些能帶來時代轉型、對人類文明史產生重大影響的原創性理論成果，可能在眼前不能產生急功

近利式的效用、帶來直接的收益，進而被視為「無用」，但這些暫時「無用」的知識在將來也許會對國家、民族及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正如洪堡在創辦柏林大學時所言：「當科學似乎多少忘記生活時，它常常才會為生活帶來至善的福祉。」<sup>25</sup>同樣，在提倡大學創新過程中，如何妥善處理大學與市場、政府、社會的相互關係，也是至關重要的。積極推進產學研、政學研合作，努力把科研成果及時轉化為實際生產力，對於中國社會發展和國力增強起著重要作用，這也是大學應該承擔的責任和使命。但同時，為保證大學真正的繁榮、科學真正的發達，實現國家、社會的最終利益和根本利益，大學應與眼前的利益和需求保持一定的距離，尤其是承擔自主創新重任的研究型大學，更要致力探究「無用」的知識。正如洪堡所言：

國家在整體上……不應就其利益直接所關所係者，要求於大學，而應抱定這樣的信念，大學倘若實現其目標，同時也就實現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了國家的目標，由此而來的收效之大和影響之廣，遠非國家之力所及。<sup>26</sup>

「無用」知識的當下無效性促使學人具備追求學術至上的價值理性觀，這也是知識創新的原動力。

創新是大學整體結構，包括觀念、體制、學校管理等方面的轉化，尤以理念的正確引領為前提。以求真為核心特徵的學術精神，為知而知的非功利學術價值觀是經典大學與現代大學理念的共同要素。自主創新成果的湧現與創新人才的培養，呼喚中國大學在揚棄傳統、超越現代的過程中，把握好經典大學理念與現代大學理念間的張力。

25 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修訂版）》，頁32、34-35、198。

26 同上注。

回顧中西大學理念變遷，可以發現經典大學理念依然存在，它已成為西方大學的一種精神。美國大學正是在吸收、借鑒與融合經典理念的基礎上，形成現代大學理念，並能保持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張力，從而推動大學不斷發展。當前，自主科研創新能力已成為國家和大學的核心競爭力，提升原創能力既是對創新型大學的要求，也是它的使命。建設創新型大學時，我們經常需要有另一種聲音的提醒，即強調追求純粹知識的本體意義作為大學人的生活態度和價值取向。只有這兩種理念相互制衡，才能讓大學在創新之路上走得更为順利、更为遙遠。經典大學理念的守望與超越共存，是中國建設創新型大學的過程中，應一以貫之的原則。

## 參考書目

1. 王英杰，《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肖萋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3. 勒納（Lena, L. E.）、米查姆（Michamu, S. J.）、伯恩斯（Bo'ensi, A. M.）著，王覺非等譯：《西方文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
4. 浙江大學史編輯室，《浙江大學校史稿》，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82年。
5. 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6. 張彬，《倡言求實，培育英才——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

7. 湯普森 (Tangpusen, J. W. )，〈歷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8. 賀國慶，〈德國和美國大學發達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9. 鮑爾生 (Paulsen, F.) 著，滕大春等譯，〈德國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